



陕北民歌剧《白衣红梅》剧照

把黄土揉进戏里

记陕北剧作家康世进

○ 王云峰



康世进

10月14日晚,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在商洛闭幕,文华大奖揭晓,名单里有康世进编剧的陕北民歌剧《白衣红梅》。

这个奖,他不是头一回拿。可这一回的戏,离他自己最近。

戏写的是“人民医护工作者”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路生梅。1968年,这个24岁的北京姑娘来到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当医生,一待就是50多年,头发都白了,人还在佳县。

北京来的女医生满口京腔,可乡亲们一张嘴,全是佳县话。

康世进也是一口佳县话。

20多年前,陕西省文化厅选派10名编剧去上海戏剧学院进修,临行前在厅里开会。会快开了,他才到。作家芦芙荭后来回忆,老康人还没进门,声音已经在屋里绕了几圈。芦芙荭问他:“你是陕北人?”他吃了一惊:“你怎么知道?”旁边一位熟人接过话茬开玩笑:“驴叫马叫,谁还听不出来?”他不服气:“可我说的是普通话呀!”

他说的确实是普通话——标准的陕北佳县南区普通话。一屋子人都笑了。

他的腿慢。13岁那年夏天,一场高烧,落下小儿麻痹后遗症,从此走路一瘸一拐。他的嘴快,笔也快。歌词写了300多首,剧本攒下50多万字,从乡村学校的土台子写到陕西省艺术节的“文华大奖”,又写到全国的曹禺剧本奖、田汉戏剧奖,成了一级编剧。他自己有句话:“我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,也和你们没落下多少距离。”

“我为什么不能当老师?”

康世进是佳县康家港人。村子大,一条沟前后十里,他家住在一处岔沟的尽头,一孔土窑,一盏煤油灯。

1973年,他上了高中。那两年,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饿。上午高粱黑馍就稀菜汤,下午一碗高粱碴碴稀饭。周末拖着腿走20多里山路回家,想吃两顿饱饭,再从家里搜刮点炒面、糠窝窝、煮洋芋带回学校。

高中毕业,高考还没有恢复,他回了村。修田打坝他干不了,大队派给他一个活,拾粪。一只破筐,一把粪铲,他摇摇晃晃走在人畜走过的土

路上,成了村里独一份的“拾粪工”。

拾了些日子,他不拾了。他走进大队部,一屁股坐到桌子上,把憋了多日的话一股脑倒了出来:“我腿有残疾,挑不了重担,怎么就叫我当拾粪工?能下地学大寨的倒去当了老师,我高中毕业,有文化,我为什么不能当老师?”

碰巧驻村包队的县委书记在场,听完,当场定了:让他教书。

民办教师,每月220个工分,4块钱。他穿一身干净的中山装,上衣口袋别一支钢笔,头发梳得纹丝不乱。白天备课、讲课、改作业,课余时间登板报、写标语、刻油印。学校是宣传阵地,他拉板胡、打鼓板、编小戏、排节目,快板、三句半、表演唱一样一样往台上推,但自己从不登台。乡亲们巴掌拍得最响的那些晚上,台上没有他。

1983年秋天,他考上了榆林师范学校。开学一个多月了,他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来——体检不合格。有人替他说了句公道话:“瘸子既然能当民教,怎么就没有当公办教师的权利?”他这才进了校门。

“熟了不摘,就掉地上了”

1985年,他从榆林师范学校毕业,分到榆林地区文工团。团里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,吹拉弹唱、刀枪剑戟,各领风骚。有人嘀咕:艺术团进个残疾人,有伤大雅。他被安排去管图书。

管图书,他给自己定了3条:团结人,熟悉舞台,写剧本。图书室近水楼台,他先把书读了个遍。1987年,陕西省首届艺术节,他作词的歌曲《摘南瓜》得了作词三等奖。1991年,他调到艺术创作中心当专职编剧。说是“中心”,其实只有3个人,是当地最小的事业单位。3个人守一个单位,他守的是一张桌子、一盏灯。

几年后,由他编剧的《大漠情》被省戏曲研究院搬上舞台,又在全国梆子戏的新剧目交流演出中拿了编剧奖。他成了全省青年编剧里的尖子,被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。在上海,他和芦芙荭同住专家楼一间宿舍。芦芙荭说,老康不说话只有两种情况:一是睡着了,一是埋头写剧本。老康有一套理论:创作就跟树上结的果子一样,熟了不赶快摘,就掉地上了。同学们跟他开玩笑:“悠着点,别把我们都拽得累死。”

他说要趁这个机会,让黄土文化和海派文化在他脑子里恋爱、结婚,再在笔底下开花结果,生出个“秦沪一郎”来。

那一年他四十岁,常得意地说:“四十男人一枝花,要趁着花开写几个好本子,不然老了,寿终正寝了,连个当枕头的东西都没有。”

“泪蛋蛋淌,袄襟襟擦”

康世进的戏,“土”。

《陕北歌谣》里,十八岁的英英嫁给一个不谙人事的小女婿。洞房夜里,小女婿尿湿了她的花衣裳,三更天惊梦醒来,一头钻进她怀里,一声一声叫“亲娘”。英英唱:“这一叫,白活了十八年。”

《大漠红柳》里,一个治沙的女人要离开亲手栽过树的沙窝窝,一开口就是

“泪蛋蛋淌,袄襟襟擦”。

泪蛋蛋、袄襟襟、沙梁梁、毛眼眼、小手手——外地人听着土,陕北人一听,心就软了。叠字是陕北人说话的习惯,也是陕北人疼人的样子:一样东西,叠着叫一遍,就像往怀里搂了一下。

这份“土”,是打小攒下的。他父亲是吹鼓手,“老五班”里的一杆铜唢呐。他小时候跟着吹手班子走村串户,迎亲、送丧,哪家有红白事,哪家就有他们。曲牌、板眼、锣鼓的节奏,他先听熟了,后来才认得谱。唢呐后来在他的戏里几乎从不缺席:《陕北婆姨》里的狗蛋爸出门打工,背上还背着一杆唢呐;《陕北歌谣》里有个一辈子与唢呐相依为命的老吹手。

他写的是老百姓的话,演的是老百姓的事,话土,事不土。他还有一桩心事:榆林缺一个自己的剧种。榆林十二个县区,秦腔、晋剧各占半壁江山,真正属于本地的剧种一直没成气候。他是最早把陕北民歌剧进秦腔、晋剧的编剧之一,后来干脆写民歌剧,《陕北歌谣》《五哥放羊》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《黄河船夫》;写二人台戏《魂铸二人台》;写道情戏《乾坤湾》。秧歌、祈雨、腰鼓、说书、唢呐,被他一样一样请上舞台。

“快下来把我扶上楼!”

2005年,他被破格提拔,当了榆林市民间艺术团团长。20年前,有人嫌文工团进个残疾人不雅,如今让一个腿脚不便的人去领导一团俊男俏女,想不通的人更多了。

但他一干就是13年。

有一年冬天,他那条好腿犯了痛风。办公室在二楼,十几级台阶。有几回走到楼梯口,两条腿实在不听使唤了,他掏出电话就吼:“我来啦!快下来把老子扶上楼!”楼上一阵骚动,有人故意接了一嗓子:“狼来啦!快去打!”一群年轻人呼啦啦涌下来,嘻嘻哈哈把他架上了楼。

一百多号能歌善舞的人,跟他处得像兄弟姐妹。他领导这支队伍,靠的不是腿,是一张嘴、一支笔、一肚子主意、一副好心肠。

兄弟归兄弟,排起戏来,他一声喊到底,丝毫不留情面,往往让人下不来台。团里不少女演员,都在他手下哭过鼻子。

他凶,是因为戏早在他脑子里活了。本子是他写的,每一场的画面他都看得见,什么样的动作、什么样的表情最能把人物立起来,他心里清清楚楚。演员差一分,他就喊一声。

他当团长那些年,团里的陕北秧歌剧《米脂婆姨绥德汉》三下西安、四进北京,进了国家大剧院,还捧回了中国艺术节的“文华大奖特别奖”。

团里的事压在身上,他的本子也没停。2014年的陕西省艺术节上,有三台大戏出自他

一个人之手,《大漠红柳》《陕北歌谣》《蒙汉游击队》同台亮相,这在榆林还是头一回。

《白衣红梅》

2018年,他到了退休年龄。职务退了,笔没退。

退休这几年,他的戏一部接一部。2000年,第九届省艺术节上,他的《岁月韶华》誉满省内外。2023年的第十届省艺术节,他一口气拿出三部大戏,其中《黄河船夫》《乾坤湾》都拿了“文华大奖”。

陕北道情现代戏《乾坤湾》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村里最有文化的高中毕业生天生,要破旧立新,跟全村顶着干。剧里的天生犹如那个坐在大队部桌子上的拾粪工。这个本子后来又获得了田汉戏剧奖。

《白衣红梅》写的,是他少年时的佳县。

北京姑娘路生梅初到佳县的那些年,那里缺医少药,一场高烧就可能毁掉一个娃娃的一辈子。而路生梅到佳县后没几年,佳县康家港13岁的康世进烧了几天,落下了终身残疾。

所以康世进写路生梅时,心里大约另有一番滋味。那个缺医少药的佳县,他是拿一条腿记住的。

戏里的佳县,就是他记得的佳县:产妇躺在土袋上生娃,老人说“黄土能渗血”。他写黄土,也写黄土上的愚昧和苦。北京来的女医生走山路,一步一个跟头,乡亲们连夜给她纳了一双“稳跟鞋”。山路有多难走,一双稳跟鞋有多金贵,一个拖着病腿在黄土路上走了大半辈子的人,最清楚。

一个北京姑娘,把一辈子给了佳县,而康世进把她写进了戏里。

今年7月16日,《白衣红梅》在榆林首演,剧场里坐得满满当当,散场时,不少人红着眼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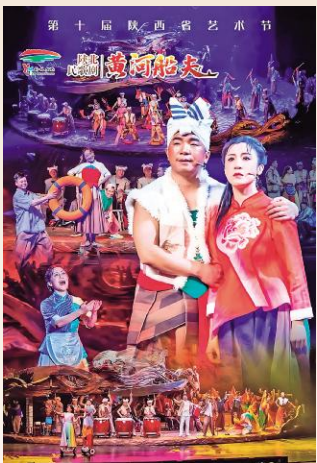
40岁时,他怕老了没东西可枕。如今,17个剧本50多万字,编成了上下两卷,书名《岁月如歌》。

这本书,翻开来,是沟,是峁,是窑洞和黄河;是“泪蛋蛋”和“袄襟襟”;是吹鼓手、放羊汉、船夫和一个个鲜活的人。这些黄土坡上的人和事,从前只在山里唱、在炕头上说,现在康世进捧起一把黄土,把它们全揉进了戏里。

《白衣红梅》里有一句信天游,前前后后唱了好几回:谁揽的事情谁扛起。

路生梅揽下的,是为佳县乡亲治病的责任,一守就是50多年。康世进揽下的,是这一方水土的戏,一瘸一拐,扛了40多年,还在扛。

(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)



陕北民歌剧《黄河船夫》



陕北秧歌剧《米脂婆姨绥德汉》剧照



陕北民歌剧《白衣红梅》剧照



《大漠红柳》剧照